

最高检厅长 访谈

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程丁赓

□本报记者 张羽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并迅速引发社会关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如何保护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做客“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针对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

呈现“三个变化”,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高质效办案

办案数据显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在2023年呈现出“刑事惩治力度不断加大、民事行政监督成效显著提升、公益诉讼积极稳妥探索”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据了解,202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2.8万人,同比上升53.3%;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案件2240件,同比增加1.7倍,提出抗诉和再审查检察建议600余件,同比增加7.7倍;立案办理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570余件。

对此,刘太宗表示,2023年,知识产权检察工作落实最高检党组的有关要求,注重在人员专业化、职能综合化、办案多元化、机制系统化等方面下功夫,综合履职进入新阶段。

特别是最高检完善顶层制度设计,让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基础更加夯实。制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提出45条检察举措,对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办案要求等分别作出规定,为办案履职提供具体指引。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加强办案组织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

例如最高检指导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刘某生等人侵犯著作权案,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全国首例“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在著作权领域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案中,权利人飞利浦公司、通用医疗公司为保证医疗器械和医疗软件的正常运行,分别设置了安全认证系统、认证工具(俗称“加密狗”)等技术保护措施。刘某生、刘某、刘某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许可,制作或销售用于避开技术措施的“加密狗”,销售盗版医疗设备软件等,销售金额达100余万元。

办案过程中,最高检加强指导,上海检察机关分别从源头和下游销售环节对盗版“加密狗”、盗版软件的全产业链犯罪行为进行审查和指控,实现从制造源头到销售环节闭环惩治。联合版权协会等发布《企业数字版权技术措施保护与合规指引》,健全数字版权保护体系,同时促进行业治理,实现了对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和全流程的保护。

服务文化强国,让群众吃上精神文化的“放心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如何才能让人民群众吃上精神文化的“放心粮”?刘太宗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著作权是文化产

准、效”五字诀,注重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领题调研,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推行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各级党委(党组)每年从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发生的有代表性、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中,至少确定1个正面和1个反面案例进行复盘剖析,解剖麻雀、举一反三。信访接待下基层,组织领导干部到矛盾多、情况复杂、信访集中的地方和单位下访接访,落实领导干部包案责任制,解决群众难题、化解信访积案。现场办公下基层,紧盯发展所需、企业所盼、群众所忧,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走进群众,现场研究、现场协调,推动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健全年轻干部下基层、接地气工作机制。

8.经常性开展领导班子政治体检。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指出的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突出问题,上级巡视巡察、审计检查、专项检查等反馈的意见,以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典型案件,要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检视剖析,找根源、抓整改。把坚持“三个务必”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员、干部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自觉养成过紧日子的习惯。把开展反面典型案例剖析作为民主生活会的重要环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个人实际进行查摆反思,以案为鉴,以案促改。

9.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坚持经常性纪律教育与集中性纪律教育相结合,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纪律规矩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筑牢思想防线,坚守纪律红线。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重点,组织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通过开展专题学习、警示教育等,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10.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级党委(党组)要持续纠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口号响亮落实差、搞本位主义、做表面文章等问题,持续深化“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统计造假以及基层治理不良现象等整改落实,持续解决执行政策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政策落实情况督促检查。紧盯形式隐蔽、巧立名目的“新形象工程”问题和



制图/张天琪

业的灵魂,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必须依法严格保护。

据了解,202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著作权犯罪2500余人,同比增加1.7倍。从案件类型看,既有电影、图书、音乐等传统领域案件,也有计算机软件、数字版权、文化创意等新技术新业态

四、坚持以学促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迎难而上、敢于斗争,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11.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委(党组)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党性分析重要内容,用好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组织领导干部和领导干部从宗旨意识、工作作风、纪律规矩等方面深入查摆剖析。指导地方和部门完善考核评价办法,纠治考核指标过分细化碎片化、机械僵化等做法。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纳入巡视巡察、干部考察考核、审计整改监督的重要内容,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警示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12.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教育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防止出现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华而不实、数据造假,竭泽而渔、劳民伤财等问题。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职责,把准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着力点,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谋划用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工作抓手,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突破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3.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鲜明树立重实干、

新领域案件。

与此同时,最高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3批150件重大侵权盗版案件,加强对下指导。例如指导山西检察机关办理了全国首例涉“剧本杀”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依法打击新兴文化领域侵权盗版犯罪,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剧本杀”行业监管,促进源头治理。

检察机关在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工作中,也重点关注了音乐作品、视听作品、摄影作品、文创产品等领域,最高检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著作权恶意诉讼监督案件。例如最高检挂牌督办、组织办理的某文化公司侵犯音乐电视著作权虚假诉讼案,涉及九省数千起侵权诉讼,刑事惩治与民事监督一体推进。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近年来,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随之而来的侵权违法犯罪行为也更加复杂多样,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更加强烈和紧迫。

202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350人,同比增长了1倍。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科技创新密集型领域,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性大。比如最高检指导江苏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被害单位为相关领域高科技龙头企业,涉案技术价值达9亿元。

直播带货行业在最近几年蓬勃发展,然而,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直播带货即时性、受众广的特点,通过“直播引流”“真假混卖”方式销假。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强化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检察机关依法加大惩治力度,同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例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直播销假案件中,对负责人及主要业务人员等5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对参与时间较短、作用较小的2人作出不予起诉决定,并及时将2人行政违法情况移送属地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避免处罚漏洞。

刘太宗在访谈最后表示:“2024年,我们将按照中央和最高检党组部署要求,聚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化强国建设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化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提升知识产权检察办案质效,完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机制,主动融入大保护格局,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报北京2月28日电)



相关访谈视频

新时代
检察故事汇

化解“从天而降”的处罚

□讲述人: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检察官 张泉泉

现代社会,诚信可谓是企业和公民的立身之本。倘若一个人上了失信“黑名单”,其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当一个这样的处罚莫名“从天而降”,意外落在普通人身上时,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化解争议彻底消除对无辜者的不良影响。

2016年8月,某市交通运输局针对何某违法从事载客业务行为作出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2020年9月,何某向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申请监督,表示其对违法运营一事毫不知情,直到发现自己银行卡莫名被冻结,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才得知此事。何某曾尝试向执行法院、行政机关提出异议,甚至提起行政诉讼,可因裁定已经生效,法院不予立案。

初看何某的检察监督申请书,我颇感疑惑:本案从作出处罚到强制执行,经历了一道道法律关卡,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乌龙?但何某提交的材料中确有其案发期间不在本市的高铁票证据,难不成他会分身?

我决定先到车管所调取何某的驾驶证档案等材料,仔细比对发现:何某的驾驶证曾经被补办过,但前后照片一胖一瘦、迥然两人。行政执法卷宗中违法行为人的证件照,也与何某本人明显不同。

根据证据材料,我们合理推测:有案外人利用自己的照片与何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以证件遗失补办的方式,向车管所申请办理了驾驶证,再用这张驾驶证,把违法运营的事嫁祸给了何某。

为尽快查明事实,盐田区检察院当即把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冒用身份信息的王某最终因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被判处刑罚。同时,该院还向有关单位纪检组移送违纪线索,核查发现相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本案驾驶证遗失补办业务时确有失职,给予其相应处分。

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对本案行政非诉执行审查裁定的错误依法予以纠正。

至此,该案已算办结。但我担忧,该案对何某的不良影响仍未完全消除,遂持续跟踪。我们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为当事人搭建沟通平台,促成王某对何某的赔偿、并取得何某的谅解,实质性化解争议。此外,我们还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撤销对何某的行政处罚,督促法院解除对何某的账户冻结和限制高消费等措施,让何某的生活尽快回到正轨。

案子画上了句号,却给办案人员留下了感叹号。它提醒我们——小案不能小看,更不能小办。一件件“小案”的背后,都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美好期待。身为检察官,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以“如我在诉”的理念和态度,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扫码看视频

如何高质效办理陈年命案

解读案例: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36年前舟山定海摘善山特大命案,经浙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凶凶被判处死刑

解读专家:西南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向燕

2023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深度解读(5)

新一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司法公正这一原则性、基础性的要求落到实处。浙江舟山海上特大杀人案就是遵循这一理念办理的典型案例,对检察机关如何实现“高质效办案”具有重要启示。

高质效办好案件,需要检察机关善用组织原则,对内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对外贯彻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浙江舟山海上特大杀人案是1987年发生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2022年该案出现新线索后,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机制优势,贯彻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实现了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对已经过了追诉时效的重罪案件,最高检严格审查把关核准追诉。舟山市检察院第一时间依法介入侦查,审查原始卷宗,补正在案瑕疵证据。最高检第二检察厅、浙江省检察院对案件办理进行了督办,指导公安机关进行现场重建和侦查实验,为指控犯罪提供了有力保障。该案的办理过程表明,检察机关对内上下一体,对外分工配合,既能统一追诉标准、防止个案擅断,又能务实指控的证据基础,同心协力高效率追诉犯罪,让被害人亲属及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高质效办好案件,应当着力于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案件质量是司法办案的生命线。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在此基础上准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保不枉不纵,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根本保障。陈年命案的证据构造具有自身特点,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客观性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运用。因被害人死亡、案发年代久远等原因,陈年命案通常缺乏强有力的言词证据。对此,应当积极运用科技手段和经验常识,探索和深挖案件中隐藏的客观性证据和间接证据,准确还原犯罪事实。用以构建刑事指控体系的证据,不仅包括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还应包括在犯罪行为前、后形成的、能够合理推断出犯罪事实的所有证据。例如,本案中警方利用痕迹物证重建犯罪现场,通过反复实验确定被告人的活动轨迹,从而形成了“新”的证据。被告人薛三元被警方抓获时告诉妻子:“不用等我回来了。”这样的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但可以依据一般情理推断出被告人对实施犯罪的认知,无疑能够强化裁判者对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

第二,细致收集辅助证据,夯实关键物证的证明力。由于过去的侦查理念、侦查手段和证据要求与现在存在差异,陈年命案的证据收集、固定和保存状况往往存在瑕疵。检察机关应当仔细审查,准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对前者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予以排除,对后者则应积极收集相关辅助证据,确认该瑕疵证据是否具有真实性,并据此决定是否予以采信。指纹是本案的关键物证,但必须确保该物证具有同一性。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引导侦查,补强了涉案指纹的发现、提取、保存、比对过程,从而确认了该关键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

第三,严格把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充分发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伪功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高程度的证明标准承担着保障无辜公民不受错误追究的重要功能,应当普遍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对于陈年命案,法定证明标准也不应有丝毫降低。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准确理解和把握证明标准,尤应重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运用。浙江舟山海上特大命案存在两大证明难点:一是无尸命案如何证明被害人死亡;二是在被告人薛三元从部分认罪到完全翻供的情形下,如何确定二人的分工。囿于该案证据状况,运用积极证立的方法很难在上述争议事项上取得证明的突破。对此,检察机关转而采取了“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证伪思路:通过气象资料,被告人杀人、抛尸的手段和地点,公安机关走访、排查结果及DNA数据库条线比对结果等大量证据,证明6名被害人无生还可能;通过现场重建和侦查实验,推翻了蒋四兴未锤杀被害人的辩解,证明二人系共同犯罪,从而高质效地办好了这起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重大案件。